

『中國·棗陽雕龍碑文化研討會』會議紀要

棗陽雕龍碑文化研究會

「中國·棗陽雕龍碑文化研討會於二〇〇六年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在湖北省棗陽市召開。襄樊市副市長曹敬蘭、棗陽市委書記岳興平、市長汪厚安，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局有關領導到會祝賀。襄樊市政協原主席、襄樊市炎黃文化研究會會長、雕龍碑文化研討會籌委會主任胡久明作籌備工作報告。《光明日報》、《湖北日報》、湖北電台、《襄樊日報》、襄樊電視台、《襄樊晚報》等多家媒體記者到會採訪。故宮博物院原院長、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史前考古專家、教授、博士生導師張忠培，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邊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研

究員王仁湘，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黃衛東、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半坡遺址發掘主持人石興邦、武漢大學考古系教授方酉生、《華中建築》主編、研究員高介華、湖北省文物處處長、研究員祝建華、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孟華平、荊州博物館研究員張緒球、湖北省旅台同鄉會理事長、《棗陽文獻》總編李發強、棗陽旅台同鄉會刊《棗陽文獻》編委李鑑瑞、台灣《前鋒日報》前鋒新聞通訊社社長胡耀坤，台灣考古專家張驥等著名專家、學者參加了研討會。會議由黃衛東副研究員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雕龍碑遺址局部發掘研究成果報告；王仁湘

研究員作《雕龍碑彩陶藝術》專題報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雕龍碑遺址發掘主持人之一王杰向研討會遞交了《超前的智慧，文明的見證》為題的論文。與會專家、學者經過實地踏勘，參觀出土器物 and 標本陳列，同時結合前期研究成果，就雕龍碑文化與周邊史前文化的關係，雕龍碑文化定位等問題進行了認真地分析與研討，取得了共識。現紀要如下：

會議認為：「中國·秦陽雕龍碑文化研討會」的召開對於進一步提高對雕龍碑文化的認識，對於促進雕龍碑，這個處於黃河中游和長江中游，兩大史前文化系統交匯地帶，文化價值的研究。對於探討雕龍碑文化與古代長江、黃河流域文化的交流、融合、創新、發展，進而形成自身獨特文化等問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必將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與會專家普遍認為，「雕龍碑文化」是周鄰其它文化不可替代的文化。其第一期主要受



新聞記者採訪石興邦教授

仰韶文化的影響，第二期是對第一期的繼承與發展，同時又受到大溪文化的影響，具傳統、創新和多元特徵，但自身特徵尚不顯著。雕龍碑第三期是繼承前二期經過傳統、創新和多元的碰撞融合，推陳出新，進而發展成爲一種新的文化。它既不同於北方仰韶文化，又不同於

南方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嶺文化，而是獨具個性特徵的「雕龍碑文化」。

會議還認為：雕龍碑遺址的考古發現，當屬我國二十世紀的重大考古發現，有著獨特的文化現象和重要的學術研究價值。雕龍碑遺址時間跨度六三〇〇年至四八〇〇年，一、二、三期文化遺存各具特色，內涵豐富。尤其是雕龍碑第三期文化遺存的聚落中，有以「田」、「日」字形主牆構建的七間套大型紅燒土房屋建築，以種植粟、稻為核心的原始農業遺存，成人墓葬統一隨葬豬下頷骨，埋葬豬的祭祀坑，嬰兒瓮棺葬具統一器形，還有一批平底加矮圈足的鼎、罐、瓮和插鉢等極具個性的陶器。這些特徵，可以說是獨一無二，是其它文化不會有，可作為反映距今五〇〇〇年上下時期，具有突出發展成就和社會結構，發生巨大變化的典型文化的例證。遺存中自成體系、帶有推拉門的多間式房屋建築遺址，以及用白灰（石灰）、麝和料等建築材料，構築屋

頂和居住面的用材和施工工藝，具有重大的建築考古價值。雕龍碑考古報告多學科結合，廣泛運用自然科學技術，對考古資料進行了全面系統的報導，科學的整理，翔實的和深入的研究，提供了新石器時代晚期地區性文化的序列框架、遺存面貌、社會生活以及與周鄰關係等系統資料。雕龍碑文化資料新穎，內涵、特徵豐富鮮明，重點展現了南北兩大史前文化系統，在這一交匯地帶，此消彼長、交流融會以至獨特創新發展的複雜現象，對深入探討南北文化之間的關係及其在中國史前文化整體進程中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張忠培教授在講話中，對雕龍碑文化與周鄰史前文化的關係，進行了深入精辟的分析，提出了很有見地的觀點與意見。他說：我們應提升對雕龍碑文化價值的認識，應該把這個地段放在一個大的空間來考察。雕龍碑遺址中最有特色的是第三期，但一、二期也很有特色，不能簡單地單劃為一種文化、有它的相對獨立

性。他還說：文化的交流、碰撞、吸收、演變與文化的開放、文化的自覺吸收、自覺交流很有關係。就雕龍碑而言。它是黃河流域通往長江流域的必經之道，也是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相互碰撞、摸索之道，是文化的壑道。所以雕龍碑文化的意義，就在於它是構建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交通樞紐，是個驛站，在這個驛站裡所體現的文化，顯示了它本身是一元為主，有多元結構的一種文化。

黃衛東副研究員結合雕龍碑遺址和周鄰遺址出土資料的系統分析和比較，就我國史前推拉門建築的淵源和發展，提出了頗具建樹的觀點和論斷。他說：河南的四個遺址看不到最早的推拉門或其雛形，鎮平趙灣、唐河茅草寺和浙川下集三個遺址出土的推拉門雖都是較原始的土質門框式類型，但由於材料不足，看不出推拉門的原始雛形，鄧州八里崗遺址的推拉門，以比較先進的木質門框式類型為主，更不可能是推拉門的淵源了。只有湖北北部的棗陽

雕龍碑遺址有較為充足的證據說明，它就是推拉門的淵源地，理所當然成爲我國史前推拉門的發祥地。他還進一步剖析說：我國史前推拉門主要流行於鄂北、豫南一帶。豫南一帶諸遺址出去推拉門的遺址皆屬於仰韶文化晚期，而鄂北出土推拉門的遺存，僅見於雕龍碑遺址第三期遺存，此遺存不屬於仰韶文化系統，目前學術界把它歸爲一個新的文化類型。推拉門正是雕龍碑第三期文化類型的先民們發明的，爾後向北傳播到了仰韶文化區域。現在，我們還在繼續沿用這一建築形式，就應該感謝五千年前雕龍碑先民們的發明創造。結合雕龍碑遺址房屋建築中還出現了可能是石灰的建材看，如此眾多而重大的發明創造，足以讓我們這樣自豪地宣稱：「棗陽雕龍碑——中國建築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王仁湘研究員在展示和解讀《雕龍碑彩陶藝術》時，對雕龍碑遺址作出了兩點最基本的肯定，他說：「雕龍碑是一種新文化」，雕龍

碑是中國考古事業中的一座豐碑」。

《華中建築》總編、研究員高介華先生對雕龍碑文化有著獨到的見解。他認為：對雕龍碑文化的認識不應當只拘守於器物、葬式等等。我們知道，人類進入文明的標誌，除了工具和文字以外，便是城市和它的禮儀性建築的出現。在中國的古代建築史上，也同時在西方古代建築史上，都還沒有看到過，類似於雕龍碑房屋的這樣一種史前單體房屋建築的記錄。雕龍碑房屋有三個特點，一是它的規模之大，單套超過了100M²；二是它的平面組合格局之複雜；三是這些房屋中，居然有這麼多古老，其實也很現代的構件，就是比較完善的推拉門。像這樣一種在總體上具有多種文化和技術因素的房屋建築遺址，不管怎麼，它確已具有自己的獨特性和重大的建築考古價值。我國著名建築考古學家楊鴻勛先生因此認定：「這樣的大型多間式房屋，帶有推拉門，用石灰質屨和料作屋頂、居住面等，還是國內首次「發

現」。高介華先生還認為，文化是一種人類活動的過程。既然是一種過程，任何文化都不能是絕對孤立產生的，它必定有可能受到周邊文化的影響，問題在於它本身具有何等特色。

石興邦研究員和方酉生教授在講話中充分肯定了雕龍碑文化特色，如帶有推拉門的大型多間式房屋建築遺存，石灰的使用等等。他們認為，雕龍碑的發現不是偶然的，由於地理文化因素的影響，必然產生與其它地域文化不同的文化現象。根據雕龍碑自然的特色和有別於其它地域文化的獨立性特徵，叫「雕龍碑文化」是可以的，也是成立的。

孟華平研究員和張緒球研究員從雕龍碑遺址的出土器物、墓葬遺跡、房屋的使用功能與家庭形態以及聚落的布局和社會組織結構等不同的側面、不同的角度進行了深入採源，並就具有獨立性特徵的「雕龍碑文化」能否成立、發表了各自的見解。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

雕龍碑遺址發掘主持人之一王杰先生，在他已發表和遞交研討會的研究文章中指出：「雕龍碑文化」是一種創新文化，是一種內涵豐富，特色鮮明，不同於已知同時期其它文化的嶄新文化。尤其是五〇〇〇多年前「雕龍碑文化」中，房屋建造技藝水平高出同時代其它文化，且達到新階段的民居文化，在我國尚屬首次發現，更是絕世奇觀。通過解剖發現，雕龍碑遺址部分民居建築，從整體到局部，每道工序在建材選擇加工、結構發明創造和施工技藝，都能做到和諧、適度、堅固耐久、舒適美觀、一舉多得的效果，表現了雕龍碑先民智慧高超、技藝精湛且規範，與現代某些民居相比幾乎沒有太大區別。雕龍碑三期民居建築格局的發展變化，石灰建材的發明應用，推拉門的發明創造等等，不僅解決了家族人口增長需要的空間，提高了住房建築的質量，加快了住房建築的發展速度，增強了民居的安全感與和諧審美的效果，而且從中可以窺見雕龍碑文化，

無不自始至終以創新的姿態，充實著自己的內涵，並創造出永載史冊的成果。王杰先生還進一步指出：「建築是人類文化的結晶，是一個民族歷史文化的標誌，代表著一個民族的精神素質。」建築最能體現聚落文化的內涵特徵和文化發展水平，它負載著「使用火的信息」、



李鑑瑞鄉親參觀
雕龍碑遺址之房頂資料

「建築史和建材史的信息」、「經濟信息」和「社會形態信息」等多種文化信息。它「把中國史前民居建築水平，提高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成為考古學、建築史學界注目的焦點，是我國乃至世界史前考古的重大發現，彌足珍貴」。

與會專家還對雕龍碑遺址的保護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見與建議。專家們認為，雕龍碑遺址，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一處不可多得的「國寶」，我們一定要倍加珍視、愛護，一定要進一步提高保護雕龍碑遺址的意識，增強保護觀念。目前在雕龍碑遺址保護方面，地方政府已經做了很多工作，令大家感動。今後如何把雕龍碑遺址保護好，專家們建議首先要做好保護規劃。根據雕龍碑遺址已列為國家「十一五」期間「大遺址保護」項目的實情，應積極爭取國家專項資金的支持，盡快編制好《雕龍碑遺址保護規劃》。規劃未審批實施之前，除了現有的房屋之外，不要在五萬多平方

米的遺址範圍內，包括範圍之外的景觀控制地帶，搞新的建設和修建新的建築。與此同時要切實加強雕龍碑遺址發掘過程中的照片，積累的實物資料、圖紙的保護與管理；要建立完整性科學的檔案，使出土資料永遠妥善保存。最後專家們一致希望雕龍碑遺址保護，能成為全國遺址保護的標兵、旗幟，並祝願雕龍碑遺址一定能夠得到全面、系統的保護。

參加會議人員：胡久明、曹敬蘭、李文烈、岳興平、汪厚安、張忠培、王仁湘、黃衛東、石興邦、方酉生、高介華、祝建華、楊晶、孟華平、張緒球、張以誠、李發強、李正榮、李鑑瑞、胡耀坤、張驥、陳玲美、李萬鈞、王忠運、文治金、石柏安、艾文金、段永建、付毅、邱光秀、程和平、樊梅、胡中才、楊振華、金京、鄒云、楊樂、畢克忠、陳千萬、唐國華、許光超、余建業、張茂昌、王勇、姜波等。

中國·棗陽雕龍碑文化研討會（代章）